改革者永远年轻

——回忆与范敬宜先生品茗话改革（上）

□成思行 刘世英 黄 尹

因为工作关系，我们采访过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和著名企业家，出版几十部名人传记。范敬宜先生是我们接触过的人当中最博学多才的亲切长者之一。因为我们的办公室离范老住所比较近，有时传记创作中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史实，多次求证于范老先生。我们在万寿路甲15号附近清香林茶楼聚晤，范老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们感觉范老就像是一部改革的活字典，他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伟大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他本人也是一个具有非凡道德勇气的改革者。熟悉了之后，我们建议说，“是否可以考虑给您也写本传记？ 范老婉拒，但他开玩笑说，如果要写传记，不如写一本有关他见证的改革风云的书，书名就叫《改革传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没有及时推进，但我们心底里却一直在构思和酝酿着。

惊悉范老于11月13日13时42分去世的消息，我们十分悲痛：没想到范老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呼啸的寒风卷起地面的落叶漫天飞舞，11月21日上午在八宝山，寒风凛冽中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范老。默默排着长长的队伍，泪眼模糊中，与范老促膝交谈的情景却历历在目，脑海中一位改革者的形象渐渐清晰。现把当时根据采访记录整理的若干片断拾掇成文，以寄哀思！

“莫把开头当过头”

范敬宜为众人所熟知，始于那篇1979年为《人民日报》所全文转载的《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在一次茶叙中，我们请范老介绍这篇文章的始末，范敬宜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娓娓道来。

1979年春天，天气乍暖还寒。刚刚经历那场历史性转折的人们，似乎还未完全从严冬中走出，怀疑、责难改革的情绪依旧弥漫。3月，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3月1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署名张浩的来信，这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应当保持稳定，反对“包产到户、包产到组”。一时间，谣言风起。

安徽凤阳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走得最早，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最多。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尖锐批评了张浩的信给农村造成的混乱。出于平衡，《人民日报》当天还发表了一封支持张浩的来信。

除了安徽，全国各地也在观望。范敬宜所在的辽宁省也是如此。“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这类内容。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很困惑，为了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

范敬宜去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对于这里，他很熟悉，1966年到1978年的十余年中，他曾作为“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了十余年。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干部们的反应：“现在农村全乱了 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到集市去看，什么都让卖了。 有些反映更强烈，“我现在晚上根本不敢开会，怕回家路上遭地主富农暗算。早上到井边挑水，看到地主成分的人来了，我就站到一边让他先挑，怕他把我推到井里去。

可是，在熟悉的普通社员家里，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说：“现在太好了。”“怎么好？ “都活起来了。”他们说，以前连种点土豆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都没活路了，现在可好了 开始有了自主权。

意见反差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

范敬宜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县里，找到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根本问题是多年来我们的干部被‘左’的思想禁锢住了，满脑袋都是阶级斗争，现在一放开，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了。看来，要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两位书记的肺腑之言让他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采访结束以后，范敬宜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真实情况，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一版上。

5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转载了这篇文章，肩题是 《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当前农村形势”，主题改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语，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由于这篇报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所以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范敬宜也名闻全国。回忆这段历史，范敬宜感叹不已：“做梦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经意中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被人民日报转载后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只有立志改革才有前途”

改革造就了范敬宜，范敬宜也用自己的努力回报改革，他说：“我切身感受到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立志改革才有前途。

从1984年到2002年，范敬宜先后担任了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但就推进改革的意义说，在《经济日报》的日子成为范敬宜最为宝贵的记忆珍藏之一

范敬宜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期，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关注，但党的十三大尚未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没有提出，社会上对于当前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非常激烈，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媒体对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解惑释疑。

范敬宜因此策划了“关广梅现象”大讨论。

在当时，关广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名字。1984年，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关广梅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夺标承包消防副食商店。实际上，关广梅当年就完成了利润18万元，当上了消防副食商店经理。

1985年，关广梅提出租赁经营的设想，并成为本溪市第一个租赁经营者。1987年初，关广梅又与辞职投身改革的本溪市委政研室处长李明一起合租5家副食商店，形成了本溪市最大的东明副食商场为龙头的8家租赁经营群体——东明商业集团。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

改革的阻力和麻烦还是伴随着商场和个人不断提高的经济效益到来了。就在关广梅当选党的十三大代表时，有人以“关广梅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为由对其身份进行怀疑。为此，关广梅写信给《经济日报》，建议就租赁企业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讨论。

1987年春天，辽宁记者站站长庞廷福给《经济日报》寄来关广梅问题的内参稿。时任编委、秘书长的舒野首先作了批示，提出此事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范敬宜和常务副总编杨尚德商量后，又与分管财贸部的副总编王昭栋研究，分别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后经编委会讨论，一致同意进行报道，决定以财贸部为主进行策划，由分管记者部的副总编罗开富同志负责全面协调，派出财贸部杨浩、谢镇江两位记者，协同庞廷福同志赴本溪进行采访。

当时，新旧体制处于激烈碰撞的状态，对于关广梅其人其事，社会一直没有权威性结论，分歧较大。加之当时“清污”正在进行，《经济日报》毅然决定在报纸上开展敏感的大讨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些惴惴不安的”。范敬宜后来如是说。

记者采访的过程也印证了范敬宜的这种担心，由于在本溪采访中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复杂情况，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记者感到阻力很大，采访困难。

为了减轻“前方”的压力，把采访坚持进行下去，范敬宜除了在电话中给记者打气外，还给时任财贸部主任的高永毅同志和三位记者写了一封表明态度的信，大意是：编委会决定开展关广梅问题的讨论，不是仅仅想弄清楚关广梅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当十三大代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讨论，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的性质，即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更加坚定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如果将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报道搞错了 一切由我负责，与记者无关。

领导的“军令状”给了记者“定心丸”。1987年6月，《经济日报》推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文章以“本溪出了个关广梅”开头，既描述了关广梅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更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随后，《经济日报》又推出了《“关广梅现象”大对话》 《论关广梅现象》等一系列报道和评论，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推出后，前后共收到读者来稿来信一万多件。而关广梅本人不仅照常出席了党的十三大，还成了十三大的“风云人物” 在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应对自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外国通讯社甚至报道称十三大刮起了“关广梅旋风”，美国时代周刊把关广梅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了介绍。最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承认了租赁制的合法地位，“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站住了脚。

“我们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

2002年4月21日，范敬宜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手中接过了聘书，成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是当时全国新闻院系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的院长。

消息传出，这个“新闻圈里的新闻”轰动一时。在兴奋之余，人们也有所怀疑：范敬宜进入清华大学，是真正地要把他的新闻改革思想化为实际的教育行动，还只是挂个闲职，图个名声？

很快，范敬宜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他不仅参加学校与院系的重大活动，带研究生，而且还给本科生开课，先后开了新闻评论与专栏写作、新闻中的文化、记者素养和采编艺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多门专业课，学校还给他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

在清华大学，范敬宜以爱护学生而闻名，学生们都称他为“伯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将清华大学学生李强写的《乡村八记》推荐给温家宝总理。

2005年春节期间，20岁的大二学生李强利用假期，按照“户—村—乡—县”的思路，对山西省3个村4个乡和两个县的农村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3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这篇文章在学院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范敬宜读后，认为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年轻学子应有的勤奋、踏实的作风和认真了解农村、了解国情的科学态度，反映的农村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这篇调查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笔给范敬宜回信： 《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作文章。”

范敬宜谈及他在清华大学推进的新闻教育教学改革，深有感触地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比如金融、法律、新的经济体制、国际游戏规则等，还要掌握高科技的传播手段。这些方面，年轻的记者们学得很快，比我们有优势。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应该改变的，比如新闻道德。而我们现在有些记者，一切以钱为中心。我们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学养应该是丰厚的，文笔也应该是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些，但起码应该能培养出几个在中国新闻界乃至世界新闻界占一席之地的高手。”

随想录

落马者缘何想念舆论监督

□司徒伟智

最好勿轻易用“假惺惺”三字诀，一笔抹杀贪官落马后的反思。 上台则句句赞，下狱必字字贬” 此种前恭后倨，难免有势利眼之嫌吧。近读《迟到的忏悔》（吴兴人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所收集241名腐败分子言论，深感其痛定思痛，从漠视修养到贪恋钱色，留下共性兼具个性的自责，足以警世。

有自责，还有他责，即对外界的抱怨，尤引人注目。书中有深能源原董事长劳德容的如此悔悟：“现在才觉得舆论曝光是爱护干部。当初我的行为，如果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也许我都会收手了。 还有胡长清伏法前更痛切之辞：“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该正视抱怨蕴含的合理内核。诚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岂容贪腐官员将罪责推给客观外界。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天网般的舆论监督，对于更治清澄须臾不可或缺。难道层层选拔上来，教养、地位都具比较优势的“社会公仆”仍然靠不住？须知唯有在严密的监督防范机制下，才可谈普遍的而非一时一地的“靠得住”。否则恰如前几年那本书，书名就叫《总统是靠不住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天然是腐败的代名词。我赞成法律史学者的见解：“法治和性恶论具有密切关系。西方的法制思想就是这样从假定人性恶的基础上启动起来的。（见郝铁川《片面而深刻的性恶论》）

可惜，舆论监督是良药苦口。两千年前的晋国执政大臣赵简子就发牢骚：“尹绰不爱我，老在公众面前批评我”。尹绰可答得好：“我不爱你的丑陋，只爱帮你剔除丑陋。 道理太简单，像一加一等于二般明白。奈何“丑陋”往往纠结着某些人的私利甚至前程，你想剔除，人家不领情，简单的道理顿时复杂化。连路面积水严重 公厕缺少标示之类工作性批评，都会在一些地方引起当局反弹，遑论抨击贪赃枉法乎！那一年张家界市交警支队为走私车上牌照，刚起头即被盯上，立马认错刹车多好。却来个下抵赖上遮掩，令调查半途而废。于是丑行放胆，丑陋升级，纷纷黑车上市，隆隆驶向八方。终于酿成大案，支队长一干人下狱，方知讳疾忌医之害。

记得报载我官员赴北欧考察，惊诧于彼邦竟然“难得发现贪贿大案”，更无肥缺职位“前腐后继”；随即知晓廉政之效有赖监督之网，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包括舆论监督。“有日月朝暮悬”，报刊电视互联网犹如一支支探照灯笼罩着当政者。香港作家农妇（即孙谈宁）刚到美国马里兰州定居，一位老记者即介绍当地同行偏好揭官员丑闻，越官大越有兴趣，“舆论矛头时时在寻找目标，准备攻击”。故此一般官老爷也就知所收敛， ‘有所不为’的人很多 他们都是拿一份固定的薪金，节节省省的过日子”（引自《农妇随笔选》） 相反相成，约束权力，亦即抑制丑闻，苦中作乐味儿香，清茶淡饭日月长。

“时时寻找目标”，会找错吗？会的。普雷斯科特 布什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当年他来东亚诸国为了谈生意，恰好其弟乔治·布什总统紧接着也赴这些地方访问，于是从国会到民间不乏猜测：“老兄是否利用老弟的九五之尊在生意上取得特惠？”事情见诸大大小小报刊。然而一经各方摊开事实，悬疑澄清，对老布什兄弟的闲话收梢了。一个正派官员何惧于舆论环境透明度高？一透明，则贪者自现其贪，廉者也自现其廉。

倘若已经不那么“廉”，出现锈斑、染上污点了 还当欢迎舆论监督否？更属紧迫。切不可像早先的成克杰及日后的谢亚龙，见谁批评就“封杀”谁。殊不知封这封那，不啻封死一己改过自新之道，到头来悔之晚矣。

文 苑

是文化冲突 还是宽容谅解

——对电影《天堂边缘》的点评

□范玉刚

我们习惯了好莱坞大片讲述的故事和风格，也熟悉了中国商业大片的悲情与空洞，但对于这部由德、土合拍的影片，其讲述的方式和故事相对陌生，是一个别有意味的关于移民的文化冲突，又带点政治和宗教色彩的故事，贯穿着别样的爱情和异域文化下的亲情，但其触及的主题却既深刻又当下，可以说观后有一种心灵的触痛感！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片中六个人，看似毫无关系的三个家庭（一对土耳其父子、一对土耳其母女及一对德国母女），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国家，彼此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交织出一个文化冲突又宽容谅解的故事，其精彩程度远超过真实的人生。在大学任教的内耶特，对年迈父亲包下红灯区妓女叶塔的作法无法认同，直到发现叶塔将辛苦钱，寄回伊斯坦堡供女儿阿伊坦求学，才有所改观。不料父亲因意外失手打死叶塔而遭判刑，愧疚的内耶特为帮助叶塔完成遗愿，决定赴伊斯坦堡寻找她的女儿阿伊坦；却不知激进的阿伊坦为逃避警方追缉，早已悄然来到德国。非法入境的阿伊坦，结识了德国女孩洛特、进而同居，却和洛特的母亲苏珊娜发生了严重冲突。在警察盘查的路上，阿伊坦遭到逮捕，并遭遣返土耳其入狱服刑。忿恨的洛特违背母命，独自跟随到伊斯坦堡，不料竟意外丧命。伤心的母亲苏珊娜接到噩耗赶赴伊斯坦堡；意外认识了在此经营德文书店、千里找寻阿伊坦的内耶特。电影线索很清晰，语言流畅细腻、节奏明快，但主题和意味并不轻松，甚至有一些沉重。虽是移民题材，但不同于上一次19世纪以殖民者为主体的移民浪潮，这次，后发国家的移民以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与发达国家相遇，经济与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隔阂与冲突，成为表现的重点。导演以时空叠构的手法，烘托出一个极为悲天悯人的氛围，格局广阔又深入。因此成就，该片荣获200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评审团大奖。

《The Edge of Heaven》中文又叫“在人生的另一边”。所谓另一边就是无处不在的别处！对于母亲，女儿是另一边；对于女儿，母亲是另一边；对于儿子，父亲是另一边；对于父亲，儿子是另一边；甚至画面与内涵都各是另一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轨迹，似乎人与人总是处在另一边。其实，即使全球化不断加速和加强的今天，我们在深刻感知全球化色彩的同时，不也在内心里感受到异域的他者的压迫吗？不也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隔阂和孤独感吗？这是一种文化喧嚣中的隔阂！这个故事并未远去，它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

主题固然沉重，但格调并不灰暗，甚至明快。“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有意义的事”，这是洛特日记中最能撞击观众心灵的私语。生命偶然，人生短暂，人应当怎样度过一生，这是每一个有灵魂的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必定会思考的问题。也许历史的瞬间就定格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个人史的书写中，某一瞬间的感动，某一瞬间的感悟，也许就成全了我们的某一个行动，它看起来无理由，却是发自心底的召唤。也许洛特就在这一瞬间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她决定全力去帮助阿伊坦，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原谅与宽恕如何可能？老妈妈苏珊娜接到噩耗从德国赶赴伊斯坦堡，在旅馆里放声大哭的场景想必会牵住每一个人的心，悲伤，成了显性的基因，而不再是低调的隐性，由此而深化了故事的主题。看着女儿的日记，老妈妈似乎看到了女儿的坚决，这坚决化解了她心中的怨恨。她去探视阿伊坦，阿伊坦哭着求老妈妈原谅她，洛特因她而死，但老妈妈说：“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帮助你，这本来是洛特的愿望，但现在是我的愿望。”谅解与宽容在爱的勇气中升华……临近片尾，导演通过老妈妈和教授的对话进一步用爱化解了冲突与隔阂。站在窗口看着窗外的人匆忙来去，老妈妈问教授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忙，教授说：“今天是节庆的第一天。有一天神说庆典需要亚伯拉罕献上你的儿子，亚伯拉罕忍痛献上儿子，但刀架到儿子脖子上时，刀忽然停顿了，神对亚伯拉罕非常满意，于是同意亚伯拉罕用羊来代替。而我父亲说，如果是他，他绝对不会送我去当献品，会极力保护我”。正是这历久弥新的爱，早已超过一切，召唤着他到土耳其北部寻找父亲。父亲出海钓鱼了 教授坐在海滩上，等待，等待原谅与救赎彼此的那一刻。

电影的成功主要源自导演独特的眼光。柏林影展金熊奖导演费斯·阿金（Fatih Akin），是土耳其裔的德国移民，1973年出生于德国汉堡。正是他犀利的眼光，对题材和时代精神的把握，以及对世界文化状况的洞察，触动了时代的脉搏，牵动了人们心底的神经和心灵的律动，并深刻领会和遵循了市场的规律。2004年，他拍摄了轰动国际的《爱无止尽》（Head On）这是他“爱情、死亡、魔鬼”生命三部曲的首部影片，在短时间内迅速窜红，成为当前德国影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近年来罕见影评一致赞赏，而票房又大获成功的影片，成功开启了新一波德国电影的盛况，也夺下年度柏林影展金熊奖。《天堂边缘》是其生命三部曲之二，电影公映后，许多国际媒体认为，该影片以电影艺术的语言，对当今的社会局势与社会状态，有着既深刻又宏观的启示。事实上，从《爱无止尽》开始，德国电影工业逐渐摆脱先前低迷不振的境况，开始在票房上重新获得观众的支持，并在影片质感上也大大提升。

《天堂边缘》的成功，对中国电影的振兴、繁荣和“走出去”不无启发。

文艺评论